

上期提要：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被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最恰当的人选。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当年，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但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1921年4月，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东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的。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是在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谋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1922年五六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13页，是用德文写成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

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便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1921年5月30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又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6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并要求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2349，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社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17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6月10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马林的一举一动。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瓏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下期看点：马林刚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沪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就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报。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克尔斯基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然而，多少年来，这位尼克尔斯基一直是个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5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也众说纷纭。多少年来，这个谜未能揭开。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凡是涉及尼克尔斯基，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唱各的调。

上期提要：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大学报到的，那是1958年9月。我坐的是慢车，从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列车上的设备非常简单，卧铺就是木条凳，靠背很低，不是卧铺的话，坐的地方连靠背都没有。列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地方买吃的，出门的时候家人给我准备了干粮和水。火车每到一个站，都要停很长时间。从窗户望出去，觉得许多城市和上海比起来差距太大了。我动身去北大报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推迟了。结果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之后，发现既没人接也没人管。

于是，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我就每天到历史学系办公室给他们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学长写的文章。我看见书架上放了许多线装书，边抄边想，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学问太大了，文章写得真好。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熟了。听他们说起考古专业，觉得很神秘。有同学告诉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实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希望未来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如果考古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我想选择的专业吗？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趣的事了。

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所以，我对考古专业充满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就要分专业，我不假思索就报了考古专业。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对考古工作究竟要干什么是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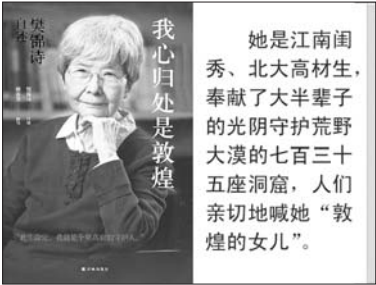
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1958年我入学之际，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北京大学也在开展“双反”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我所仰慕的张政烺先生被调离了北大，马寅初校长也遭到了批判。

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教学改革的风潮中，北大的很多师长依然坚持一丝不苟的教学，依然有同学照常勤奋学习。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学习氛围，感受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我记得历史学系当时还建立了统一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经过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扩充，资料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给师生的教学科研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历史学系还协助中文系筹办了“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文献的人才。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是整个50年代北大的校园氛围中，洋溢着为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热情，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街上已经没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学生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但大家也没有苦的感觉，普遍比较乐观和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到北大学子的学习热情，图书馆里总是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读书。这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粮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荤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没有肉，全是素的。刚到北方，吃惯了米饭的我，一开始不习惯吃面食。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也就十来块钱，戴得起手表的学生很少。如果某个同学戴着手表，大家



就说他是“有表阶级”。

入校之后，我们58级学生因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机会较多。我们1959年参加陕西省华县发掘工地的“认识实习”；1960年参加怀柔抢救性发掘；1961年参加正式的生产实习——昌平县雪山发掘，发掘了雪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和辽代居住遗址。这么多实习机会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很好的锻炼。1961年到1962年新开的专业课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分别由吕遵谔和严文明两位老师讲授；1962年到1963年新开的专业课是秦汉考古，由俞伟超老师讲授。

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学生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当时有不少专家名人来北大讲演，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创作的热情；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马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尔丘克，还有我国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吴祖光，相声大师侯宝林，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经到北大与学生们交流。

我对艺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雷雨》，当时要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再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人艺。我们从剧院回来时错过了最晚的班车，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园，到学校时已是凌晨四点了。这样的精神恐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的北大人就有那样一种朝气和热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亲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父亲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断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图书，北大过去去过多少人才。这确实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历史学系大家云集，其他系也是一样，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三位先生在为人处世、治学方法各方面各有特点。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治学风格的老师，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师的长处。学生在主要受某个教授的影响的同时，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这是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健全的教学格局与学术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是北大精神传统中重要的方面。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继承全人类所有文化遗产的眼光和气魄。对于多元的中国文化，对于新的现代文化，对于西方文化，都鼓励学生培养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

下期看点：195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史学系也随校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部燕园，组成新的机构，名称由原来的史学系改为历史学系。院系大调整期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为抢救全国各地大规模建设工程中所发现的文物，培养考古文物工作人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设立了考古专门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中起来，连续办了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奠定了后来考古学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础。